



1

人口增长的幽灵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创世记》1:28

作为《圣经》中的众多谕旨之一，上述圣谕将人口增长与主宰世界直接联系起来。但今天不幸的是，征服地球似乎就是要毁灭地球。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这一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全球环境陷于危险境地，人口的膨胀看来不仅危及我们自身这一物种的生存，而且会让整个生物圈走向灭绝。毫无疑问，迅速增长的全球人口和前所未有的环境破坏均为现时代的两大特征，可是，尚难肯定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二者中任一方固然都会影响到另一方，但它们本身更主要由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构、组织所铸成。考察一下人口增长的本质和环境破坏的实际原因便可澄清这层关系。

向人口增长宣战

大多数人记住 1968 年，是因为当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枪杀、芝加哥警察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场外与反战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但这一年也是最近一轮反人口增长声浪的起点。当年，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炸弹》，让全球人口增长的威胁牢牢地定格在公众的意识中。埃利希恰如走向大马士革的圣徒保罗，是在路途当中得到了天启的灵感：

长时期来，我一直理智地理解人口问题，几年前在新德里一个热浪滚滚的夜里，我却感性认识了这个问题。我与妻子和女儿正搭乘一辆老掉牙的出租车回饭店。车座上跳蚤们正在此起彼伏地跳跃，只有第三挡传动还管点用。当车子蜗牛般爬过城市时，我们进入了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温度早已超过华氏 100 度，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烟雾，街道上看来人气正旺。有吃喝的人群、洗澡的人群、睡觉的人群、闲逛的人群，还有争吵喊叫的人群。有人手伸出出租车车窗在讨钱，有人在随地大小便，有人在攀拉着公交车，有人在驱赶着畜生。人，人，到处是人。我们蚂蚁般穿过混乱的人群，汽车喇叭叫得震天响，尘土、嘈杂、闷热、炊烟，简直给人以地狱的感觉。我们还回得了饭店吗？说实话，我们 3 人都已惊恐万分。看起来什么都会发生，当然，最后什么也没发生。老资格的印度通可能会嘲笑我们的反应，认为我们不过是些养尊处优的游客，不习惯在印度的所见所闻。

或许是吧，但自打那一夜起，我算领教了人口泛滥的滋味。^①

埃利希如此成功地攫取了美国公众的想象与恐惧，以至《人口炸弹》两年中居然印刷 13 次之多。

人口增长在 19 世纪即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托马斯·马尔萨斯预言，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地快速增长，大大超过以算术级数增长的食物供应。与埃利希一样，马尔萨斯也被芸芸众生的景象所震撼，只是在他那时，触动他的是工业化时代英国穷人的幽灵。

马尔萨斯惯于丑化英国的下层百姓，如出一辙，埃利希的妙论也明显地隐含着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心态。要不，他为什么偏要描写新德里的拥挤街道，而不去描写，比如说，人种混杂的曼哈顿岛类似的场景？须知，在曼哈顿乘坐出租车也绝非乐事。结果是，埃利希这位专业的生物学家，相当不科学地通过诉诸感官，让美国读者恶心第三世界的拥挤与贫穷，借此来开始他的议论。如此带着偏见地讨论人口问题实属司空见惯。《经济学家》在其展望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那一期封面上，即把人口称为“里约忘却的问题”^②，配发照片的镜头自然不拍《经济学家》所在的伦敦那摩肩接踵的几百万人，而是对准了一帮面有菜色、脸黄肌瘦的第三世界儿童。

在埃利希看来，人口增长不仅仅是 20 世纪人类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它实际上孕育着一场地球历史上铺天盖地的大灾难。

保罗·埃利希：《人口炸弹》（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68 年），第 1 页。

② 《经济学家》第 323 卷，1992 年 5 月 30 日。

埃利希把人口炸弹称为以往“10 亿年”中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他描绘了一幅日益膨胀的人类以热核炸弹和滴滴涕威胁着地球生存的画卷。^①只是他从未解释这些威胁怎样归因于人口增长。如果“人类”以灾难性的武器威胁着这颗行星，难道当挥舞这些武器的人减少一些时，“地球飞船”受到的威胁就会缩小吗？譬如说，如果是由 10 亿人，而不是 50 亿人部署我们的核武库，地球就会安全些吗？按照埃利希的观点，人类做些什么、如何生活是次要的，首要问题倒是其数量。

勿庸讳言，人口已经成为问题。它酿成了饥谨与贫穷，破坏了环境，并威胁着南半球黑兄弟们饥饿的眼睛所看到的第一世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或者，套用埃利希返回德里饭店这段描述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游客还能否安全地抵达奢华的居所？

人口增长的恐惧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埃利希之后不几年，罗马俱乐部推出了那本令人纷争不休的《增长的极限》，警告说按照当时的增速，地球人口的极限将降临在 21 世纪某一时刻。^②1989 年，《时代》在其以地球为年度风云“人物”的那期杂志中，直接把人口增长与环境破坏挂起钩来。据其报道，“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会使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陷于

埃利希写道，“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是以往几十亿年中地球上最为重大的事件。现有 35 亿人居于地球，该数字每年增加 7000 万。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类拥有从热核炸弹到滴滴涕等各式武器，其威胁是可能会摧毁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生命。人类本身可能正濒临灭绝，在其临死阵痛中，它会带走地球这一宇宙飞船上的其他大多数乘客。以往 10 亿年中，没在哪一件地质事件，甚至如雄伟山脉的隆起、全部次大陆的沉沦、周期性冰河时代的出现，像人口膨胀这样对地球生命构成了如此重大的威胁。”（保罗·埃利希和安妮·H·埃利希：《人口、资源、环境》[旧金山：W·H·弗里曼出版社，1970 年]第 1 页）。

② 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伦敦：帕恩出版社，1974 年），第 24 页。

灭顶之灾。’^① 当年晚些时候,《科学美国人》也随声附和,声称“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及其对地球环境的相应浩劫都是最近发生的事,人们尚难估量其正在造成多大的破坏。”^② 请注意,《时代》和《科学美国人》都祭起了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这一马尔萨斯的幽灵。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扯淡。人口在某些地区的确极大地大幅度地增加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保持那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毫无疑问,保罗·埃利希让公众注目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还是值得称道的,一般而言,也似乎可以原谅他早期著作中的偏见与夸张。可十分遗憾,以后多年里,他不仅信念未改,而且连那套末世言论也一成不变。^③ 他与妻子安妮于 1990 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坚持认为自己 20 年前描述的人口炸弹已最终引爆。该书的护封上写道,人口过剩是我们的头号问题,相较之下,全球变暖、雨林破坏、灾荒饥馑、空气和水体污染都显得无足轻重。

如今,人口压力的画面已广为人知。还是在那期以地球为年度风云“人物”的杂志中,一位作者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巴西先前“混沌未开”的森林里,“成群结队的移居者在刀耕火种、开山劈路。”^④ 《时代》的另一篇文章则描写了墨西哥城的一个聚居区,一百来号人共用两个浴室,“油腻污水弥漫、臭气扑鼻、苍蝇

《时代》,1989 年 1 月 2 日,第 26 页。

② 《科学美国人》,1989 年 9 月,第 119 页。

③ 埃利希除在人口方面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大声疾呼,不过,其观点多属悲观末世说一类。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曾坦言存在着核冬天的灾难性威胁(参见《生态演化季刊》,1984 年秋季号,第 88-93 页)。1991 年,他与安妮·H·埃利希合著了《治愈这一行星》(马萨诸塞州雷丁·艾迪生-韦斯利出版社),此书论述了若干重要的环境问题。

④ 《时代》,1989 年 1 月 2 日,第 32 页。

漫天飞舞。”^① 我们再次像在埃利希前引文中一样，“领教了人口泛滥的滋味”。

尽管保罗·埃利希及其追随者言之凿凿，人口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却如 19 世纪马尔萨斯的结论一样，依然聚讼纷纭。当考察主要污染物的实际来源以及森林毁灭、物种消亡等问题的原因时，盯住人口增长不放倒像是西方社会在为规避其国内和全球环境责任而找出一条逃遁之路。虽则第三世界的人民已经并且必须继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对人口问题，但我们身处工业国的人们一方面要协助他们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正视由我们自己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给世界其他地方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何种人口危害地球？

人口爆炸多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可是多数的环境破坏，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后果的环境破坏，却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例如，我们发现，破坏臭氧层的含氯氟烃是从工业国的空调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产和各种喷雾剂中释放出来的。不幸的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环境影响多由第三世界的穷国来消受。有毒垃圾装船驶离工业国港口，为寻找一个填埋地点而周游世界，最后极可能落户在某个急等现钱的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国中已禁止使用的有毒杀虫剂依然畅销于发展中国家。近至 1991 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尚“污染不够”^②，现应接纳自工业国运来的有毒废料。

^① 《时代》，1989 年 1 月 2 日，第 48 页。

确实由第三世界自己造成的多数环境破坏也往往导源于第一世界，因为后者的经济发展项目输出了危害环境的政策。历史地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激励性项目，鼓励发展危害环境的化学依赖型农业和旨在出口而非自足的单一作物种植。^①此外，第三世界国家承受着压力，被迫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摆脱其众所周知的国际债务负担。这改变了原以自立为特点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取而代之的是用工机会日少的大规模农业。庞大的农业企业耕作着以前由森林覆盖或者由自立的农民综合利用的大片土地，那些从传统生活方式中被连根拔起并且流离失所的人们被迫移向贫瘠荒野之地，以勉强糊口度日。由此而造成了森林砍伐、物种消亡、沙漠扩大、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当研究环境恶化的全球成因机制时，不难看出，第三世界的人口可以在未来稳定下来，但这对全球变暖、臭氧破坏、有毒废料产生等环境问题的影响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对与森林砍伐相关的那些环境问题也仅有一般性的影响。

尽管如此，今天的第一世界一方面以其汽车释放出酿成酸雨的污染物，另一方面却一直把手指戳向第三世界：如果有朝一日这几十亿人也达到西方的繁荣程度那还了得？那么多新增的汽车、冰箱、发电厂不是要让全球环境万劫不复吗？

这里的答案应是，把手指对准我们自己，并且记住那句古老的格言：“正人先正己”。眼睛盯着第三世界潜在的驾驶员干脆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们自己已在自己所排出的汽车尾

^① 印度尼西亚政府所作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银行向环境破坏活动发放的贷款额……比向据称环境无害活动发放的贷款额高出 10 倍”（《跨国监测》，1987 年 6 月，第 15 页）。

气中奄奄一息。例如，一项研究预测，到 2010 年，日益恶化的空气质量在洛杉矶一地便将造成每年 10 万人的死亡。^①

鉴于工业国家把有毒污染引向了世界，现在他们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应当迫在眉睫地为人类的生存与福祉建立一个健全的根基。工业国理应倾注其财富和知识，努力发展一种以非污染性技术为基础的可持续经济。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必须确立有关项目，在全球范围推进这种经济。这些项目的宗旨将包括协助世界人民确定并实现某种可取的人口规模。让社会和经济正义与人口稳定、环境健康携手共进，当是可以做到的。

人 口 与 贫 困

诚然，必须看到，不断膨胀的人口在世界不少地区是在危及环境。竭力扩展可耕地的人们刀耕火种，导致土壤侵蚀、沙漠化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庞大的人口也会以其废物污染水体，以其废气污染空气；热带社会人口日增，伐毁热带雨林，大批物种危在旦夕。然而，恰如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多由西方直接或间接或由国际市场压力而间接传输过来，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实由全球经济的侵略本性挟裹而至，因为全球经济瓦解了原本处于稳态的社会，而且让其无法获得新的平衡。从多方面说，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不过是同一根本疾患的不同表征而已。对第三世界而言，这种疾患就是原先自力更生的人民在近现代经历着贫困与依附。这里所说的贫困不是那种“原始”人群因缺乏工业社会的种种技术设施而似乎存在的穷匮，“原始”人群毕竟坐拥

埃里克·曼：“洛杉矶的滚滚烟雾”载《民族》，1990年9月17日，第268页。

一套有活力的文化和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第三世界的贫困是被剥夺了足以维系自身生存的经济手段之后而呈现的困厄。

人口爆炸的一大成因是全球市场关系打破了人口变迁模式。人口变迁模式是一个四阶段的人口理论，专门适用于欧洲和北美从 18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的工业化进程。^① 第一阶段是前工业化社会，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结合形成稳态的人口；在第二阶段，工业化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和医疗有了改善的机会，由此引起死亡率降低，再加上出生率居高不下，便形成人口的增长。然而，第三阶段的出现需要生活水平继续提高，这样才最终会引起出生率下降；在第四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处于低位，故而再次形成稳态的人口。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第二阶段，但由于新殖民主义剥夺了其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因此第三阶段来得很慢，甚至不会到来，这样，人口增长无法稳定下来。如要达到最后阶段，必须改变新殖民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国际援助项目，而代之以一种瞄准当地民众需求、使之脱贫致富的经济结构。

经济对人口的影响可由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帕西人人口所产生的后果来举例说明。1881 年，帕西人是印度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当时，他们被英国人选定为在印度的代理人。随着东印度公司和大英帝国的成功，帕西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境况也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到 1961 年时，尽管印度的总体人口持续增长，帕西人的人口却在减少。^②

贫困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也交织着心理、文化和社会诸方面

参见 小约瑟夫·A·麦克福尔斯，“人口：一篇生动的导言”，载《人口通报》，1991 年 10 月 第 32-37 页。

② 杰曼·格里尔：《性与命运》（纽约：哈珀出版社，1984 年），第 445 页。

的因素。单独地看，贫困会引起人们特别重视由传宗接代所获得的自尊，故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把生孩子当作展示能耐、体现成熟的一种方式。当社会无法提供安全、地位和机会时（第三世界的妇女尤其如此），大家庭往往成为派生尊严、意义和未来希望的唯一源泉。^①此外，贫困也使芸芸众生无法得到节育器具和保健服务，也即无法少生孩子和生育更健康的孩子。为制止人口危机，我们必须制止贫困。^②就此而言，埃利希所领教的“人口泛滥的滋味”实为热浪、臭气、跳蚤、破车的滋味，更精确地说，是领教“贫困的滋味”。

西方社会居高临下的观点也瓦解了人口控制的努力。当西方观察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时，它只看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而当第三世界观察这同一问题时，它却看到了对食物、居所、工作，以及经济成功的需要。在西方眼里，正是人口增长妨碍了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西方对本已受害的人们横加指责，认为世

弗朗西丝·穆尔·拉帕写道：“生态学家太过经常地忽略一个事实，即人类的生殖决定与几乎所有其他生命体绝然不同，它们不是纯由生理控制的，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力量也施加着影响。当社会无法向人们（特别是妇女）提供安全、地位和机会时，只有家庭（而且往往是越大越好）有可能提供这三件东西。……身为第三世界中的父母亲，许多人士地被日益剥夺，工作机会屈指可数，卫生保健、教育、老年保障难以获得，传统的宗教和集体组织又再也不能给予生活的意义感，于是只能在对孩子劳力和收入的预期中求得安全保障，也只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求得足可抵消社会异化感的某种补偿”。（《于特纳读者》，1988年5-6月，第81页；本期《于特纳读者》就人口增长问题作了多角度的透视）。

参见巴里·康芒纳，《与地球媾和》（纽约：庞锡农出版社，1990年）；所有这些问题均可循一条途径来解决，即消除贫困。贫困是发展中国家迄今未能稳定其人口的原因；贫困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营养不良、疾病和饥饿的原因；贫困是他们难以采用生态型经济发展这一补救办法的原因；贫困循环相生，使发展中国家力图克服贫困之悲惨后果的努力陷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如果世界人口危机的根源就是贫困，那么我们必须消灭贫困才能制止人口危机”（第166-168页）。

界的穷人多生滥育，咎由自取。按西方的思路，为殖民主义及新殖民主义承担历史责任，并且纠正它们所造成的经济失衡，这是无法痛快接受的任务。然而，把我们的家庭规模标准强加给并无我们同等教育、经济和政治机会的其他民族，是徒劳无益、残忍无道和荒诞不经的。

与此类似，世界性饥荒也如同环境破坏一样经常被归因于人口过剩。可是，全球农业与分配问题的分析家却发现，饥荒更是政治问题而非人口问题。^① 素食者知道，为吃肉而饲养动物，所消耗的蛋白质比这些动物产出的蛋白质要高出许多倍，所以有人建议，制止世界饥荒的一个办法是从食物链的顶端下移至素食层次。另外，第三世界许多地区是为出口而非本地消费而生产食品，全球性农业企业和出口导向的农业造成了单一作物种植，致使丧失了本可为当地人口提供营养的适宜、高产的本地作物品种。农民辛劳所得不能保证其自身需要，反倒流向了遥远的公司。因此，世界饥荒实植根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因素中，单靠减少人口根本无法直接地补救这些因素。

与饥荒一样，人口增长本身也植根于全球经济的与政治的权力关系之中，这种全球权力关系尤其影响着穷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在现代世界里，人口增长及其相随的环境问题来源于诸多因素，包括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殖民统治时代以来的税收和

^① 参见如弗朗西斯·穆尔·拉帕和约瑟夫·科林斯，《民以食为天》（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77年），“经研究发现，农业环境的破坏并非缘由一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盖源于其他势力：土地垄断者出口食物和奢侈作物，这种出口迫使大多数农民过度使用边际性土地；殖民时代的税收方式和经济作物种植方式仍沿用至今；居心虽好却考虑欠周的‘援助’及其他形式的外来干预打乱了历来协调有序的系统；本地和外国上层阶级不负责任地唯利是图。”拉帕和科林斯得出结论：“即使把未来的全球人口减少一半也不会遏制上述的任何一股势力”（第45-46页）。

经济作物种植方式、瓦解传统适宜体系的援助项目、唯利是图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发达国家酿成了工业污染，在发展中世界则破坏着文化与经济的稳定，招致人口增长及相应的环境压力。

有关当今的人口爆炸，不管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还是贫困这一端，解决办法并无二致，这就是提高世界底层阶级的经济自足水平并增强其政治自主能力。为减少第三世界对环境的冲击，先需要为这些贫穷困苦的人们实施一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生育将是此类项目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也只是多环中的一环。更为关键的是，应赋予正经历人口高增长率的世界穷人以政治权和经济权。特别是应将此置于新的文化框架中，这一新文化对人的重视将不是基于其物质财产或者生育能力，而是基于其素质、努力和成就。虽然人口增长会极大地加剧环境问题，但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往往同由另外的历史因素造就，尔后再结伴而来。因此，只有愿意触及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人 口 与 社 群

回顾第三世界甚或是西方国家的历史，考察一下数百年中各个不同文化是如何处理有关人口增长和自然环境问题的，这能给人以启迪。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古时代¹，许多社会借助其本土文化，维持了一种人口稳定、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机制。

远非今日，欧洲的计划生育习惯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效果显

著。研究 16 至 19 世纪的英国、意大利、荷兰，可揭示某种注重人口稳定的文化特质。有关方法包括贞操观念、生理节奏法生育控制、性交中断（拔出射精）、性交克制（男性克制射精），这些不同方法属于男性及女性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节育技法的熟练老道经常是自尊的组成要素。^①文化传统与习俗，如社会期待的成婚年龄、寡妇再婚的可能，等等，均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当然同时也与时俱进，俾以适应社会繁衍相延的需要。

当代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人类学研究也揭示了各地人口控制的种种办法，简直令人目不暇接。^②印度尼西亚的达尼人在孩子出生后 4 到 6 年中禁绝性生活，看起来也未有痛苦不适之感。新几内亚的禁忌要求人们在作物生长季节禁绝性生活，以保证番薯收成丰硕；缅甸人依靠严格苦修的佛教生活来抑制性欲与行乐，达到人口节制的目的；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在为时 3 年左右的哺乳期结束之后大约 6 个月一般才会再开始性生活，婴儿喂养奶的推销却破坏了这一世代延续的制度。由此可见，世界各地从古到今的众多社会都历尽艰辛，促使人口控制手段成为其文化的内在特征，借此成功地维持了人口数量与可供资源的平衡。^③

该论述引自格里尔：《性与命运》。格里尔的结论是：“当着手研究其他国家的人口节制制度时，我们也许会记得在四百来年中，不靠任何天外来客般的计划生育机构的指手划脚，我们在人口增长和以农为本的经济之间实现了令人满意的平衡。”（第 101 页）

以下例子也引自《性与命运》。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在所著《人口问题》（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 年）中罗列了原始社会节制人口的近两百个案例，对卡尔－桑德斯著作的出色概述见于理查德·C·威尔金森，《贫困与进步》（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3 年），第 3 章。

格里尔：《性与命运》，第 348 页。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主导世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欧洲文明侵扰世界，这种历史稳定性被击得粉碎。^①在此进展下，传统的小农社群遭到瓦解，无地劳工被赶进工业中心找寻工作，或者被驱往荒土野地勉强生存。节制人口的能力原本与自给自立的社群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知识与行为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社群，即使仅处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也看重某种生活质量，从而倾向于限制家庭规模。传统的做法大致保持了一种与死亡率相应的出生率。当客观条件可维持人口增长时，比如出现了风调雨顺、新型作物引进或农业技法改良等情况，有关风俗即会缓慢变迁，以允许人口有所增长。^②近现代历史上，先在西欧再至全世界，日益扩张的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方式构成了重大压力，原有的遗产被灭绝。不管你对人口增长的原因与后果持何种看法，对自立社群的破坏，连同对其传统人口控制风俗的破坏，反正剥离了传统社会应对变迁的一项重要能力。

这些传统文化的丧失也标志着与地球相关的一种历来行之有效的的生活方式同时丧失了。小国寡民、自给自足、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强调土生土长的文化与社群，也鼓励人们悉心监护自然世界。人类学家用“生态平衡”这一术语来描述人口水平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的和谐关系是通过那些重视人类

人口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即使在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中间，也聚讼纷纭，此处只提一点，即欧洲人口的迅猛增长发生于 17 世纪，亚洲的发生于 18 世纪，美洲和非洲的发生于 19 世纪。科林·麦克伊夫迪和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史图集》[纽约：史实档案出版社，1978 年]。

从负面看，在当代社会，这些传统的缓慢演变有时会延长上述人口变迁的第二阶段。例如，某些部落社会曾通过把男性尊严与子嗣数目挂钩起来而从文化上适应了高生育率的需要。在这些社会里，即使今日妇女期望降低生育率，男性依然坚持其文化特权，这种态度甚至会让出发点再好的人口控制计划也无法奏效。

社群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种种文化习俗来实现的。^① 处于生态平衡中的社会了解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维持着一种既保证环境存续又保证社群存续的生活方式。因此，对前现代化社会而言，人口控制与生态照应实为同一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两个侧面。

当一群人的福祉有赖于当地的水源供应、当地的土壤肥力、当地的食物出产时，这些自然资源往往会被尽心呵护。即使这样的社群真的从事某种伤害环境的活动，其影响所及一般也仅限于当地而已。^② 以社群为基础的企业活动不可能产生跨国公司经营所造成的全球环境后果。但是，恰如现代社会瓦解了传统的计划生育，它也侵蚀了人类代代相传的对自然环境悉心眷顾的传统，这种环境眷顾与计划生育一样，是以追求生态平衡的可持续社群为存在基础的。

我们当代的环境和人口问题将需要根据当代的新情况，通过建立生态平衡的新理念而综合解决。为此，理解社群概念，理解与之相随的自立、合作、稳定、监护等价值观，将对于树立一种富有生态智慧的文化，对于建立一个向环境负责的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工业国为自己寻求一种可持续的自立生活方式时，他们也将消除全球经济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压力。这与旨在鼓励自给自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援助项目一起，将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以环保方式解决其经济与人口问题的能力。

参见威尔金森，《贫困与进步》，第 3 章。

威尔金森（第 88 页）援引了对一非洲部落的研究。该部落即使在过度放牧导致水土流失的情况下，仍自豪地维持着一套传统的放牧制度，而这最终会摧毁其传统文化。虽然在此例中当地所受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但它对全球的冲击却微乎其微。